

心学影响下《金瓶梅》创作的矛盾心态

代伟

(陕西理工学院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摘要】思想的变革必然会带来价值体系的重构。明代中后期正是这样的“破而未立”的时期。心学的传播和深入使得禁锢人性的程朱理学被冲决,个性解放潮流大行其道,但是也造成了矫枉过正的混乱的社会局面。面对这种矛盾,《金瓶梅》的作者笑笑生在作品中以儒释道核心观念积极探索挽救社会风气的道路。

【关键词】《金瓶梅》;心学;矛盾心态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4-0012-05

明代中后期是我国古代社会思想大变革的重要时期,人们开始逐渐从宋明理学的樊篱中解脱出来。程朱所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思想受到了严重冲击,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倡导人性解放的心学及以王艮等为代表的“王学左派”成为主流。但随着“人性解放”思想的传播和深入,社会风气和人的价值观念出现了矫枉过正的乱象,对金钱和人欲的过分崇拜和追逐弥漫于整个社会。成书于这一时期的《金瓶梅》自然把握住了思想大变革的脉搏,作者笑笑生在创作时也表现出了既肯定人性解放又反对人性“过分解放”的矛盾心态。

一、心学思想在《金瓶梅》中的体现

明初,太祖朱元璋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纲常礼教,将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加以大力倡导,使之成为了统治人民、维护政权稳定的思想武器。而到了明中叶以后,“作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受到了人们普遍的唾弃与嘲笑,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要求个性解放,主张人格独立,重视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尊严成为一股强有力的社会思潮。”^{[1]19-20}在《金瓶梅》中,这种个性解放思想主要表现在婚恋的相对自由和生活品质的高追求上。

“人们的价值观念通常会在婚姻问题上得到敏感的反应。”^{[1]301}《金瓶梅》中的孟玉楼,是小说中人物形象较为正面的且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她的婚姻经历就很好的体现了个性解放思潮对人们的影响。孟玉楼本是布商杨宗锡的“正头娘子”,怎料丈夫外出贩布,不幸“死在外边”。丈夫死后,玉楼身边无子女,经薛嫂儿介绍后嫁与西门庆做妾。当然玉楼的再嫁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亡夫的姑妈杨姑娘与娘舅张四虽然都同意玉楼再嫁,但分歧在于再嫁的对象上。杨姑娘主张玉楼嫁与西门庆,而张四则主张嫁与尚推官的儿子尚举人为继室。一方面,

西门庆是“清河县数一数二的财主,在县前开个大生药铺。家中钱过北斗,米烂陈仓”^{[2]119};另一方面,尚举人是“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颇过得日子”^{[2]124}。按传统的婚姻观念,尚举人这种出身官宦人家、有丰厚物质基础,又功名加身的男子应该是最理想的配偶,但在这场新兴商人与传统官僚地主的博弈中,传统官僚地主败下阵来。这无疑是金钱对传统“诗礼”的完胜。薛嫂在向西门庆介绍玉楼情况时说道:“他守寡了一年多,身边又没子女,止有一个小叔儿,才十岁。青春年少,守他什么!”^{[2]117}当张四舅面对着众街坊要阻止玉楼出嫁时,杨姑娘开口道:“列位高邻在上,我是他的亲姑娘……他身边又无出,少女嫩妇的,你拦着不教他嫁人,做什么?”^{[2]127}而众街邻则高声道:“姑娘见得有理!”从媒人、长辈、邻里的言语中我们看到婚姻自由思想已经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在孟玉楼的改嫁已经与封建伦理的“从一而终”相悖的情况下,她仍然依自己的想法择婿,不得不说这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强烈表现。

小说中潘金莲与西门庆的结合充满了罪恶和无耻。王婆为了让他们“长做夫妻”又不被武松报复,献计鸩死了武大,她直言道:“……却把砒霜下在里面,把这矮子结果了,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没了踪迹。便是武二回来,他待怎的?自古道‘幼嫁从亲,再嫁由身’,小叔如何管得!”^{[2]93}王婆阴险歹毒的嘴脸固然表露无遗,但我们从中仍可看到当时市民的婚嫁观,即初嫁的决定权在亲属,再嫁的决定权则把握在自己手中,即使是夫家的人也奈何不得,这明显地与传统的“三纲”背道而驰。孟玉楼和潘金莲的再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妇女的“松绑”和主体意识的唤醒以及婚恋的相对自由。

衣着服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政

收稿日期:2014-11-24

作者简介:代伟(1991-),男,陕西安康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叙事文学。

治风向、经济水平和文化心理。在明太祖时,政府就对服饰的制式有着严格的规定,后又经过几次增补修改,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但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到了成化、弘治年间,服饰日渐奢华,甚至出现了僭越现象,虽有诸多禁令也很难维持很长时间。至明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服饰生活逐步冲破了传统伦理等级制度,向美学化、个性化方向发展,形成了服饰发展追新求异的繁荣景象。”^[13]《金瓶梅》的创作年代,正是等级制度逐渐瓦解和等级观念逐渐淡薄的年代。小说中随着财富不断的膨胀,西门庆家族在衣着服饰上也出现了竞华斗艳,甚至越礼的现象。小说第七十三回玉楼生日,应伯爵在酒席上看见:“西门庆白绫袄子上,罩着青段五彩飞鱼鳞衣,张牙舞爪,头角峥嵘,扬须鼓鬚,金碧掩映,蟠在身上,唬了一跳。”^{[2][1128]}原来西门庆所穿这件飞鱼鳞衣是东京何太监所送,明代出现的“鳞衣、飞鱼服、斗牛服作为龙袍的衍生物,只被赐给内使监宦官、蒙恩的宰辅”^{[13]26}。所以西门庆以此为荣,认为“此是一个大分儿。”而张竹坡则用“奢僭至此”来形容西门庆的狂妄自大。

第十五回中,上元节西门庆众夫人赏玩灯楼时的穿戴更是奢华无比。

吴月娘穿着大红妆花通袖袄儿,娇绿段裙,貂鼠皮袄。李娇儿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楼是绿遍地金比甲,潘金莲是大红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盈,凤钗半卸^{[2]230}。

在明初,普通妇女的衣着是不允许用大红色的。而吴月娘却视禁令于不顾,其僭越现象可见一斑。妇人们如此打扮,引得观灯的人们纷纷猜测道“已定是那公侯府里出来的宅眷”或是“贵戚亲王孙家艳妾,来此看灯。不然,如何内家装束?”由此可见,服饰上的等级观念已被打破,人们已不再按照古制穿着。追求鲜艳、华贵成为已当时的趋势。

《金瓶梅》中对饮食的描写十分细致,第十回写道:“……水晶盘内,高堆火枣交梨;碧玉杯中,满泛琼浆玉液。烹龙肝,炮凤腑,果然下箸了万钱;黑熊掌,紫驼蹄,酒后献来香满座。碾破凤团,白玉瓯中分白浪;斟来琼液,紫金壶内喷清香……”^{[2]161},在这段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西门庆家族在饮食方面也存在违礼现象。熊掌、驼蹄本只有皇室宗亲才有资格享用,而西门庆“凭借金钱的优势,在饮食消费上也实现了‘僭越’”^{[4]7}。

从西门庆家族锦衣玉食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窥探到在商品经济逐渐繁荣的冲击下,人们在生活上的奢侈骄逸取代了以往勤朴尚俭的作风。故明初

制定的种种礼制对人们的约束力越来越小,等级观念亦渐渐被破除。

二、心学的主要观点及心学影响下形成的文风

《金瓶梅》成书的万历朝是心学思想大行其道的时期。究其根源,可以从当时社会思想、政治、经济方面探求。

心学,是由南宋陆九渊开创,明代王阳明集大成并将其发展成为一套完备的哲学体系。

在陆学中,“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把“心”作为其最高的哲学范畴。王阳明不仅继承发展了“心”的思想,还提出了其心学的核心思想“良知”说。“良知者,心之本体”^{[5]61}，“良知”源于孟子的性善论,是指人先天固有的“善性”。由于王阳明把“良知”作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从而取代了‘天理’最高的本体地位,打破了‘天理’主宰一切的格局,高度肯定了人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11]7}王阳明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理”,否定了作为主体的人之外还有一个“理”的存在,用“心”取代了“理”,又因为“心”是“身之主宰”,从而大大提高了人的主体地位。他还强调“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把良知作为“人的内在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评价体系”^{[6]213},摒弃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重视人在价值判断中的主体作用。在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方面,王阳明不赞同“格物穷理”,提出了“反身而诚”的方法,通过自省来达到人格的完善,人的主体意识由此得到高扬。王门后学、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是道”:“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7]10}。这里的“道”不仅包含了道德准则,还包括了日常生活的“穿衣吃饭”这些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充分肯定了人的合理欲望的必要性。后来,罗汝芳又提出了“赤子之心”,是指人最初的本心,是不学不虑而自然存在的,认为人要顺其自然,率性而为。所以,无论是“良知”、“百姓日用即是道”,还是“赤子之心”,都承认包括物欲和人欲在内的合理欲望和自然人性,为当时小说家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政治方面,自宪宗开始,统治阶级内部的腐败、荒淫引起了士人的不满。明宪宗宠幸万妃,重用宦官汪直等佞臣,使得纲纪败坏,厂卫横行。孝宗即位后,驱除奸佞,任用贤良,励精图治,终于迎来了“弘治中兴”。其后在位的皇帝除却穆宗算得上明主外,武宗、世宗、神宗要么荒淫暴戾、沉湎声色,要么好方术、嗜服丹药,要么长期不理朝政。统治者

尚且如此,臣民们便更加肆无忌惮了。再者明代以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科举考试中以朱熹对经典的注释为权威,使一批儒士为博取功名利禄,表面上尊孔重道,背地里却行苟且无耻之事。“异端”思想家李贽就曾言辞激烈地批评假道学为“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续焚书·三教归儒说》)。政治上的腐败使思想家们不得不寻找一条匡扶朝政、整顿风气的道路,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心学的发展。

经济方面,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使得市民阶层不断壮大的同时,城市也日趋繁荣起来。在商品经济的驱使下,从前以耕种为生的农民也积极投身到新的生产关系中来。市场的扩张也带来了东部沿海经济极为发达的商业区,如杭州、苏州、南京等等。这时的商人已不再是明初的“四民之末”,他们为整个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这不得不使思想家们重新审视商人的地位。王阳明就对工商业者有着这样具有进步意识的评价:

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5]941}

王阳明认为“士、农、工、商”只是由于“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导致的分工不同,在“有益于生人之道”的目的上是相同的。他还批评了“荣宦游而耻工贾”的愚见,高度肯定了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

由此观之,当时社会的种种现象对文人们的创作有着深刻地影响,从而形成了一股崇尚自然,尊重个性,正视人欲、物欲的文风。《金瓶梅》作者笑笑生受这种风气影响较深,故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尊重人性解放的一面。

三、笑笑生在《金瓶梅》中反对人性“过度”解放

然而在破除理学枷锁、大胆张扬人性并在繁荣的商品经济的引领之下,社会上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局面。人性的“过度”解放造成了人欲、物欲的泛滥,人们对情欲更加放纵,对金钱更加崇拜。《金瓶梅》的作者笑笑生也意识到了此种现象,所以在作品中以人物悲惨的命运结局为训诫,以此来反对人

性的“过度”解放。

在《金瓶梅》表现出来的极为肮脏的现实生活中,以潘金莲、西门庆为首的“淫夫”、“淫妇”们奢靡享乐、纵欲无度,最终导致了人性的毁灭和生命的覆灭。

小说中潘金莲模样姣好,机变伶俐,女工针指、品竹弹丝、读书识字无所不会,还缠得一双好小脚。自从进了西门府,她扭曲、变态的心理使她肉体上的欲望更加强烈,而西门庆生性浮浪,在外眠花卧柳,所以“欲火难禁一丈高”的潘金莲与仆人琴童偷奸,后来又和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发生不伦的关系。西门庆死后,被逐出家门的潘金莲又和王婆之子王潮儿苟合,在武松遇赦回到清河县后杀嫂祭兄,最终落得个剜心割首的悲惨下场,为她无休止的欲望付出了血的代价。

西门庆也是在欲海之中灯枯油尽而亡的。自他得到了梵僧的春药之后,原本就纵欲的他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当吴月娘规劝他时,他的理由是:

却不道天地尚有阴阳,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缘簿上注名,今生了还。难道是生刺刺,胡搗搗,歪扯斯缠做的?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2]843}!

在西门庆看来,偷情、苟合都是前生注定,今生了还的,而金钱正是打开欲望之门的万能钥匙,更是死后得到超生的不二法门。最终西门庆在几粒春药的“催促”下精尽人亡。

小说中另一淫妇春梅更是“淫欲无度,生出骨蒸癆病症”,如此还不禁欲,仍贪淫不已,终于“一泄之后,鼻口皆出凉气,淫津流下一洼口,就呜呼哀哉”^{[2]1568},死在了淫乐的世界里。

《金瓶梅》的世界里,对金钱物质的追逐也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绒线铺伙计韩道国的妻子王六儿被西门庆包占后,西门庆不仅给他家买丫鬟,还要替他们在“大街上买一所房子”。唯利是图的王六儿认为“也是我输了身一场,且落他些好供给穿戴”。而韩道国得知此事后并没有责骂王六儿,反而无耻地说道:“等我明日往铺子里去了,他若来时,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承他些儿。如今好容易赚钱,怎么赶的这个道路!”^{[2]575}后来何官人包养了王六儿,何官人死后,王六儿一家竟然继承了他的财产。这里面反映了当时社会贫富差距的悬殊自不必说,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可以为了

金钱物质而不择手段。

西门庆还曾说道:“兀(钱财)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怎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2]828}西门庆这一段对财富的评价不乏调侃之意,一者反映了他灵活的商业头脑,二者也为他奢靡淫逸、及时享乐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宴请宋、蔡二御史时就花了千两金银,连带把桌席上的金银器一并送与这二位,其奢侈之风可见一斑。

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这样说道“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其他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无不小补”、“既其乐矣,然乐极必悲生”。由此观之,作者做《金瓶梅》的目的在于劝善惩恶,拯救世风,而方式是“以淫止淫”。

四、中晚明的社会背景及笑笑生对挽救社会风气的探索

明朝中后期政治的腐朽、纲纪的紊乱是从皇帝开始的。明武宗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荒唐皇帝,他不仅设“豹房”,耽于美女作乐,还把皇宫装饰成市井商铺模样,让太监、宫女扮作百姓,自己则扮作商人与他们讨价还价,更为离谱的是他将自己封做“威武大将军朱寿”巡检边境,甚至带兵抵御少数民族的侵略。世宗嘉靖皇帝在“壬寅宫变”后便沉湎于道教方术,专心炼丹,“不复视朝,惟日夕事斋醮”^{[8]49}。万历皇帝早期在张居正的辅佐下尚勤于政务,张居正死后便沉溺酒色,三十年不上朝。统治者消极怠政、荒淫恣肆给臣民起到了消极的示范作用,使明初严肃、高效的政治风气发生逆转。

在此种政治风气的影响之下,大多官吏为了迎合皇帝而阿谀谄媚,甚至开始结党营私、相互攻讦。官吏中饱私囊、奢靡邪侈者比比皆是,如嘉靖八年,饥荒连岁,虽有诸多救荒之策进上,但多为举义仓耳。唯有广东金事林希元上《救荒丛言》,详陈救荒良策,“上嘉其言,然竟不行。大抵救荒无他法,惟上官悉心经画。如甲午河南一赈,到少卿钟化民力居多,二贪令借赈自润,竟置重典,法始得行”^{[8]319}。又如“故相江陵公,性喜华楚,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虽李固、何宴,无以过之。一时化其习,多以侈饰相尚”^{[8]316}。官吏士大夫皆尽心钻营,贪赃枉法,穷奢极欲早已蔚然成风。

在民间,普通百姓也没有了明初勤朴尚俭的作风,社会秩序陷入一片混乱。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今天下赌博盛行,其始失货财,甚则鬻田宅,又甚则为穿窬,浸成大伙劫贼”、“又有嗜赌者,将妻妾

卖奸以偿负进,亦有并妻注而输去者”^{[8]880-881}。在这种自上而下的腐坏的社会中,《金瓶梅》作者笑笑生在作品中表达出了对社会风气及社会出路的担忧。面对人们抛弃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而追求人性解放的现象,作者开始反思,这样的“弃”和“求”是否会为社会带来进步?是否真正会把人性从理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其实,在作者的意图中,他虽然反对理学中禁锢人性的一面,但又并不赞成激进的人性解放而造成的泛滥现象。在作者心中,传统道德秩序中维护社会稳定、净化社会空气的古制应该继续传承。而在当时旧的价值体系开始瓦解,新的价值体系还未形成的时代,作者始终在这种“反传统”又不得不“依赖传统”的矛盾中寻找平衡点。所以这样的矛盾心态也反映在《金瓶梅》中。小说里宋蕙莲便是矛盾心态的典型代表,先是她再嫁来旺已经与“从一而终”有违,后又与西门庆成奸。私通后在物质财富的攻势下她屈从于西门庆,宋蕙莲“衣服首饰、香茶之类不算,只银子,成两家带在身边,在门首买花翠胭脂,渐渐显露打扮的比往日不同”^{[2]343}。但当西门庆想长期占有她而设计陷害来旺时,她又为了解救自己的合法丈夫向西门庆求情,最后被西门庆蒙骗含气自缢而死。一方面宋蕙莲为了利益而屈身于施财者、性伙伴西门庆;另一方面在丈夫遭遇西门庆迫害时,她又竭力相救。这样的矛盾正是新的价值观和传统伦理道德相冲突的真实写照。

《金瓶梅》的作者深受传统儒释道的影响,所以他在试图探索挽回严重失调的社会秩序时也是从儒释道入手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主要就是‘三纲五常’,它既有封建性落后的一面,又有民主性进步的一面”^{[9]53}。它规定了封建社会关系的等级制度,但又具有规范社会伦理的功能。在小说中作者的纲常观念较强,如“潘金莲私仆受辱”一回中,潘金莲与琴童苟合,作者写道:“一个不顾纲常贵贱,一个那分上下高低”。同时对儒家核心观念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当时为数不多的正直官吏,作者也大加赞赏,如对东平府尹陈文昭这样称赞道:

平生正直,秉性贤明。幼年向雪案攻书,长大在金銮对策。常怀忠孝之心,每发仁慈之政。户口登,钱粮办,黎民称颂满街衢;词颂减,盗贼休,父老赞歌喧市井。正是:名标青史播千年,声振黄堂传万古。贤良方正号青天,正直清廉民父母^{[2]158}。

还对巡按御史曾孝序敢于弹劾西门庆等人表现出高度的赞扬。当然作者更多的是从反面来批评当时的儒林的。如蔡京结党营私、卖官鬻爵,蔡

御史以权谋私,为西门庆的生意大开便利之门等等。深刻揭露了当时封建士大夫的丑恶嘴脸,并给予了无情的鞭笞。

佛教强调的因果轮回也是作者强烈关注的一点。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认为,“现世界人们的穷富祸福,是前世所造善恶诸业决定的‘果’,今生的善恶行为,则是导致来世祸福报应的‘因’”^{[10]75}。其实,《金瓶梅》就是一部因果书,欣欣子《金瓶梅序》明确提出:“至于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小说的结场诗也说道:“阅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西门豪横难存嗣,经济颠狂定被歼。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2]1579}为人物的命运作了评价,同时也讲到了报应不爽。小说中西门庆慕财恋权,贪恋美色,做尽恶事,导致家破人亡。他骗奸别家妻子,自己妻子却被人拐跑。潘金莲心狠毒辣、贪欲无止,死后曝

尸街头。反观吴月娘,乐善好施、讲经诵佛、菩萨心肠,其子孝哥被高僧点化,自己则七十善终而亡,“此皆平日好善看经之报”。孟玉楼宅心仁厚、品性中庸,最终落得个好姻缘。作者尤其强调因果报应,其目的始终是为了劝诫世人远离欲海,广行善事。

道家的清静无为也被作者当作挽救人心的要旨。如“更无荣无辱无忧”,“但倦时眠,渴时饮,醉时讴”,“却也清幽,也潇洒,也宽舒”,“好炷心香,说些话,读些书”,“明朝事天自安排,知他富贵几时来。且优游,且随分,且开怀”(《金瓶梅词话》)。充分流露出作者远离尘嚣、回归自然的情怀,同时也劝告世人保持无欲无求、内心宁静的状态。

《金瓶梅》作者笑笑生在肯定人的合理欲望的同时,面对人性“过度”解放后社会上出现的丑陋现状,探寻用儒释道的核心观念来挽救社会,企图扭转人心不古的局面,这种积极探索的勇气还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宋克夫,韩晓.心学与文学论稿: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文学概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2]兰陵笑笑生.金瓶梅[M].济南:齐鲁书社,1991.
- [3]李小虎.《明史·舆服志》中的服饰制度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9.
- [4]刘衍青.消费文化视域中的《金瓶梅》——以饮食消费为例[J].宁夏社会科学,2010(5).
- [5]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6]陈来.宋明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7]王艮.王心斋全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 [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9]闫桐,韶玉.笑笑生与儒道佛——《金瓶梅》创作的主题意识蠡测[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4).
- [10]孔繁华.《金瓶梅》与宗教[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1(1).

Jin Ping Mei Creation of Ambivalen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Yangming Philosoph

DAI We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anx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nzhong, Shanxi 723000)

Abstract: The change of thought brings value system reconstruction. In mid and late Ming Dynasty is the period of “broken and did not set”.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of the mind spread and further made Neo-Confucianism, the philosophy which imprisoned humanity, be under attack. Liberation of individuality current beca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but also caused overkill’s chaotic social situation. In the face of this contradiction, the author of *Jin Ping Mei* used core concept of the 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in works to explore the way of rescue social values actively.

Key words: *Jin Ping Mei*; Yangming’s philosophy; ambivalence

(责任编辑:周锦鹤)